



杨曾文/主编

中国 佛教

基础知识

宗教文化出版社

宗教知识丛书

中国 佛教 基础知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 佛教研究室/编
世界宗教研究所

杨曾文/主编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佛教基础知识/杨曾文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编.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2016.5重印)

(宗教知识丛书)

ISBN 978-7-80123-179-6

I. 中… II. ①杨… ②社… III. 佛教-基本知识-中国 IV. B9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83301号

中国佛教基础知识

杨曾文 主编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44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95210(编辑部)

责任编辑: 张越宏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960×1270毫米 32开本 12.875印张 270千字 插图135幅

2005年7月第2版 2016年5月第1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23-179-6

定 价: 28.00元

再版前言

宗教知识丛书(包括《中国佛教基础知识》、《中国道教基础知识》、《中国伊斯兰教基础知识》、《中国基督教基础知识》、《中国天主教基础知识》)自1999年1月出版以来,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这套丛书向读者提供了准确、简明的五大宗教基本知识,既有纵向的各个时期的历史概述,又有横向的分门别类的知识介绍。

本丛书的每位作者皆是学养深厚的知名学者,此次再版,作者对内容进行了修订。同时,我们对这套书重新进行了装帧设计,每本书增加了百余幅插图,力求图文并茂。《中国佛教基础知识》、《中国道教基础知识》插图由张越宏搜集整理,《中国伊斯兰教基础知识》插图由余葶、张伟达搜集整理,《中国基督教基础知识》、《中国天主教基础知识》插图由张秀秀搜集整理。

宗教文化出版社

二零零五年七月

执笔人(以姓名笔画为序):

方广锴	昶藏加
华方田	张新鹰
杨曾文	黄夏年
魏道儒	

总 序

我国是多种宗教信仰并存的多民族国家。各种宗教源远流长、根深叶茂、千姿百态，有漫长的历史沿革。除道教、民间宗教等本土宗教外，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世界性宗教也都先后在华夏大地上安家落户，并以其特有的方式对中国人的知与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各教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由于受适者生存“金律”的制约，都很重视入乡随俗问题，并在民族化、本地化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异质的外来宗教思想文化能在异国他乡生根、开花、结果，这一事实一方面生动地体现了宗教信仰所具有的顽强的生命力，同时它也再次验证了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印证了她那和而不同的文化宽容精神和纳百川于大海的宏伟气魄。因为若没有主体文化的宽容和对客体文化的吸纳，各种外来宗教很难有安身立命之地。所以今天我们中国学界在探讨宗教现象时，总是毫无例外地将它们置



于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思维框架中予以观察和思考。概而言之,大家达成的一个最重要的共识,就是把各种宗教如实地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由此乃有爱国爱教相统一的说法,乃有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中国文化。

我国各种宗教长期并存、持续发展、不断演进的基本事实,提示我们宗教是个动态的概念,具有丰富厚重的文化内涵,其形态、趋向和功能处于不断演进的状态之中,没有常驻常在的原型。因此,我们应当用开放、发展的观点和心态来观察和思考人类宗教现象,力求全面地、历史地、辩证地认识和对待宗教现象。由于各种宗教皆有其完备的信仰体系,形成以宗教意识形态为内核和导向的形神兼具的宗教文化传统,得到作为文化载体的广大信徒的广泛认同,情况相当复杂,因而认识和了解宗教绝非易事。特别是对人数众多的我国不信教的公民而言,他们一般总是对宗教相当无知或知之甚少。这样,在中国这种特殊的国情下,由于人们对宗教的无知或价值取向不同而不能正确地对待宗教的现象,几乎是难以避免的。可是,从历史的眼光看,不了解中国各种宗教,便不可能真正完整准确地把握中华民族自身的历史;从现实眼光看,不了解宗教也就很难正确地对待宗教、尊重宗教信徒及其社会群体。这样看来,学一点宗教知识,确有必要;特别是对那些从事民族、宗教、公安、国家安全、外事工作的国家工作人员,可以说是做好本职工作的一项基本要求。这样说恐怕是不过分的吧。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我们这些宗教专业研究人员,应该有义务用我们所学专业知识做一点宗教基础知识的普及工作,其结果便是这套“宗教知识丛书”。编写丛书过程中有以



下几个基本考虑。首先,以在中国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五大宗教”为丛书覆盖的基本内容,每教自成一体,各编著一本书。各册丛书在照顾到自身特殊性的前提下,采取大体一致的编写体例,互相呼应。其次,注意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在体例编排上,既有纵向的历史概述,又有横向的分门别类的简介,构成纵横交错、动静结合的框架体系。第三,以提供准确、简明的宗教基础知识为主旨。文字力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每一宗教基础知识板块下所列的条目事项力求有较多的信息量。

学海无边,学无止境。尽管本丛书各册主编皆是学术功底深厚的著名专家学者,他们为编好丛书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但因丛书成书时间很短,难免会有些失当和不足之处。欢迎广大读者提出批评建议,以便再版时予以修订。

吴云贵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于北京劲松寓所



前 言

佛教发源于古印度,传入中国已经历了整整二千年。佛教在传入中国后经过漫长的岁月,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宗教习俗的会通融合中,演变为中华民族的宗教之一,并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对于佛教传入中国这一重大事件确实值得隆重纪念,并有必要结合佛教中国化的成功事例认真总结立足于民族文化吸收外来异域文化的宝贵经验,以作为今天我们汲取世界一切先进文化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繁荣民族文化的借鉴。

本文仅就佛教的传入及佛教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概述笔者的一些想法,并以此作为本书的代前言。



公元前6、5世纪，佛教发源于古印度。公元前2世纪沿着通贯亚洲大陆的丝绸之路传到中国现先后与优劣的背景下篡改前引《魏略》的文字而成，是不可信的。

关于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时间，在历史文献中最有影响的说法有两种：一是西汉末年的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一是东汉明帝永平年间。现在学术界一般采取第一种说法。

据《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裴松之注引三国魏鱼豢《魏略》记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浮屠，即佛陀；从《魏略》的介绍来看，《浮屠经》不是一部普通的佛经，当是讲释迦牟尼佛生平传说的经，如后来汉译的《本起经》、《本行经》之类的经。大月氏（或作大月支）原居中国敦煌、祁连山一带，公元前2世纪因被匈奴战败，被迫西迁，征服大夏，占领阿姆河、锡尔河流域，大约在公元1世纪建立贵霜王国，并将所占地域扩展到整个印度西北地区。此地及周围地区早在公元前3世纪已经信奉佛教，大月氏在迁徙到原大夏所居地方之后，很快就受当地风俗影响也信奉佛教。从公元前后中国与印度、西域的交通来看，《魏略》所记汉哀帝时大月氏使者向博士弟子口授佛经的说法是可信的。在此后的《世说新语·文学篇》刘孝标之注、《魏书·释老志》、《隋书·经籍志》等书中也有这种记载，但受经的博士弟子之名或作“秦景宪”、或作“秦景”。然而在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二则谓：“哀帝世元寿年中景宪使于大月支国，受得《浮屠经》”；唐法琳《辩正论》卷六谓引《魏略》及



《西域传》曰：“前汉哀帝时秦景使月氏，国王令太子口授于景，所以浮屠经教，前汉早行。”是说博士弟子景宪或秦景出使大月氏受经而归。这些记载晚出，是在佛、道二教辩论佛道先后与优劣的背景下篡改前引《魏略》的文字而成，是不可信的。

关于东汉明帝遣使求法说的最早记载是汉译《四十二章经序》。大意是说明帝“夜梦见神人，身体有金色，项有日光，飞在殿前”，早晨问群臣所梦为何神，傅毅回答说：“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轻举能飞，殆将其神也。”于是派使者到大月支国抄写佛经《四十二章经》而归。东汉末年的《牟子理惑论》也有类似记载，但情节有所发展。此后受佛、道二教斗争的影响，一些人将明帝遣使求法进行新的编造，在此基础上增添不少情节。一是确定求法的时间，西晋王浮伪造《老子化胡



洛阳白马寺



经》说明帝在永平七年(64)遣使求法,永平十八年(75)归(《广弘明集》卷九载《笑道论》引);还有其他的说法。然而最有影响的是《历代三宝记》卷二所说永平七年遣使,永平十年(67)归国的说法。二是增加迎请大月支僧人迦叶摩腾(或作摄摩腾)来华的情节,说使者用白马驮经及佛像而归。南齐王琰《冥祥记》(《法苑珠林》卷十三引)、梁慧皎《高僧传》卷一、《历代三宝记》卷二等的记载最有影响。

永平求法说在后赵王度上呈石虎的奏议中,在北魏太武帝取缔佛教的诏书、唐太宗的《三藏圣教序》以及在唐代韩愈上宪宗的《谏迎佛骨表》等重要文献中也被作为历史事实反复引用,以此作为佛教传入中国的开始。这种说法之所以具有巨大影响,可能与所传说的佛教三宝(佛像、佛经、僧人)同时传入有关。从当时历史背景考察,汉明帝求法说的基本情节还是不容轻易否定的,至于汉明帝何年派遣使者,使者是谁以及何年归国等细节,因为史书无征,可以阙疑。但这只是佛教向中国的进一步传播,而不是佛教传入中国的开始。

《后汉书·楚王英传》记载,楚王刘英晚年“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永平八年(65)明帝下诏天下有死罪者可以用缣赎罪,刘英派人到国相(中央派驻封国主持政务者)献黄缣白纨赎罪。明帝得知,立即下诏:“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按,男居士)、桑门(按,沙门)之盛饌。”示意刘英无罪,勿须心怀不安,并退回缣纨让他作供养居士、僧人之用。这说明在东汉明帝时佛教已经被作为黄老方术的一种在社会上层部分人中流传。

通过上述事实,以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作为



佛教传入中国的开始是比较妥当的。当然,从实际情况考虑,也许在此前佛教已经随着来自印度、西域的商人、移民传到中国,但因为没有文字记载,是不足为凭的。

二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佛教传入中国后,必须适应中国古代的社会环境,必须与以皇帝为首的封建中央集权的国家相适应,与以儒家为正统的多元文化结构相适应,与以汉族为主体的由多种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相适应,否则就难以立足,不能发展。历史证明,佛教以其教理的多样性和融摄性、行为规范的忍让和协和精神、处世应变的“智巧”(“方便”),善于将世与出世、王法与佛法、戒律与伦理等相会通,因时因地做出适当的回应和解释,从而使佛教不仅能够不同的历史时刻和场合一次又一次地摆脱危机,而且能在与中国传统文化、习俗的长期会通与结合中,逐渐发展为中国的富有鲜明民族特色的重要宗教之一。

在佛教向中国社会的传播过程中,佛经翻译是一项重要的事业。大量来自印度或西域的佛教经典必须译为中文才能使中国人接受。在汉族和兄弟民族的佛教学者,以及来自印度、中亚佛教学者的密切合作下,从两汉至隋唐,约有 5000 多卷的佛经被译成汉文。中国学者在参与译经时,以自己熟悉的儒道学说来理解佛经,并使用当时人们易于理解的语言概念来翻译佛经的字句和讲解佛经,从而迈出了佛教民族化的第一步。汉译佛经中的“道”、“心”、“性”、“理”、“本无”等





毗卢遮那大佛(龙门石窟)

等,成为佛教在后来进一步与儒、道等中国传统文化会通融和的重要概念。

魏晋至南北朝时期,佛教已经普及到社会各个阶层。由于中国佛教学者对大小乘佛教有了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开始产生一些带有民族特色的佛教学派。因受儒家心性论的启示和影响,佛教界盛行探讨众生有无生来具有的觉悟基因——佛性和众生的心性染、净等问题,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隋唐时期,相继形成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等富有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标志着佛教民族化历程的基本完成和中国民族佛教格局的确立,此后进入中国佛教的持续发展时期。7世纪以后,佛教从汉地和印度传入我国西藏地



区,后发展成为藏传佛教,构成北传佛教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佛教宗派也前后传入朝鲜、日本以及越南等国,对这些国家的历史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中国从一个佛教输入国一跃而成为北传佛教的中心。

佛教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概要来说有以下几点:

一、佛教的传入和民族化,丰富和充实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佛教与儒、道二家的互相争论与彼此吸收的过程,促进了中国民族文化的发展。

二、中国以儒家为正统的哲学比较重视以家长制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伦理的论证,重视以治国安民为出发点的天(自然)人(社会)关系的考察,而不注重对人和一切生命的本源、宇宙的本体的探讨,虽主张敬神祭祖,但对灵魂和死后世界缺乏神学论证。佛教拥有极其庞杂的教义和哲学理论,从大的方面说,它的时空无限、体用相即、心性染净以及对心理作用的详细分析,对心在解脱成圣过程中的作用的说法、善恶因果报应论等,都对中国哲学的丰富与发展产生极大影响。标志中国传统哲学高峰的宋明理学的形成,是与儒学大量地吸收佛教和道教的思想分不开的。当然,对于佛教的某些消极影响也不应忽视。

三、历代佛教僧人重视在山高林深的清静的地方建寺修行和传法,同时在寺院周围地区开辟农田果园,种植花果林木,为开发山林地区经济,活跃地方文化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四、佛教极大地影响中国文学、美术、雕塑、音乐、建筑的



发展。

五、中国是世界上拥有图书文献最多的国家。这些文献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知识宝库,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唐代四部图书有5万余卷,佛教经典约有它的1/10;清代修《四库全书》收编图书3503种,79337卷,而大致与此同时编纂的《龙藏》收佛典1675卷,按卷数相当于它的9%。现正在编纂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正、续编(正编已经完成),计划总收佛典4200种,23000卷,按卷数相当它的29%。此外中国还有很大数量的藏文佛典。佛教文献,体裁多样,既有佛典的经、律、论,也有对佛典的注释、各种论著,还有传记体和编年体的史书,以及年表、偈颂、语录、类书、词书、游记、变文、目录等。

佛教至今仍是连接东亚各国的一条重要的“黄金纽带”。在古代的中外佛教文化交流中,佛教不仅是一种宗教,而且是重要的文化载体。历史证明,朝鲜、日本等国在接受来自中国的佛教同时,还把当时中国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其他思想文化引进自己的国家。朝鲜、日本的到中国求法僧和中国的传法僧对这些国家的文化进步与社会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会通融合是双向的,佛教由此而实现了中国化,中国传统文化得以更加充实和丰富。这是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中华民族吸收外来文化的一个成功的范例。

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的统一





菩萨立像（隋）

强大，各民族的团结，为中国佛教提供了新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各民族信奉的各个佛教派别的佛教徒的大团结和大联合。四十年来，中国佛教走过了正常传播和发展、遭到严重挫折和恢复振兴的曲折的道路。在“文革”结束特别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随着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深入落实，中国佛教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广大佛教徒在建设社会主

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伟大事业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全国佛教徒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正在为进一步加强佛教自身

